

格等于劳动量”的最优状态。这与供求决定论中价格放开的思想也是一致的。然而,长期以来,人们由于对劳动决定论的误会,在实践中形式化地套用它,硬性根据劳动量多少给商品定价,使价格无法波动,失去了信号作用,结果反而使“供求平衡”的局面无法实现。所以,在具体实践中,只有不搞按劳动量硬性定价,才能最终实现“供求平衡,价格等于劳动量”的状态。而当这种状态达到后,即使不再人为干预,价格也将较稳定地与劳动量

相等,这才是客观规律的力量,这才是“劳动决定论”的本来面目。

今日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期,我们必须解除长期以来对“劳动决定论”的误会,还真理以本来面目,用真正的“劳动决定论”及与之并不矛盾的供求决定论来指导我们的实践。

(责任编辑 蔡德诚)

劳动价值说误导的症结何在?

Where Lies the Crux of Incorrect Guidance of Theory of Labour Value?

刘立群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欧研究所 北京 100732)

《科技导报》1993年第1、5、8期先后刊登了王则柯教授和韩彪同志关于劳动价值说与价格机制关系的文章(以下简称王文、韩文)。这一讨论意义重大,触及经济学理论的核心问题,必须彻底弄清。不过,这涉及十分广泛而深刻的理论问题,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择其要者略述个人观点,以就正于学术界。笔者基本上赞成王文观点,但我认为不论罗列多少实例,并不等于能解决理论上的问题,理论问题还需用理论所概括的事实和理论本身的逻辑力量来解决。

纵观劳动价值学的历史,有两点十分引人注目。第一,主张此说的人大体上都是货币金属论者,配第、斯密、李嘉图为代表(当然,这不等于说货币金属论者都主张劳动价值说)。这是因为,由于他们认为货币只能是金、银等贵金属,而贵金属的价格本身也是波动的,不可能很好地充当“价值尺度”,即商品交换的共同尺度,因此便认为只有“劳动”才能够充当“不变的价值尺度”。第二,他们所说的“劳动”仅仅指进行直接物质生产时的体力劳动,认为只有这种“劳动”才“创造价值”,而不把科研工作、经营管理工作等视为这种劳动。这与他们寻找社会分配不公的原因直接有关。李嘉图认为这原因就在于“劳动者阶级”劳而收获少,“资本家阶级”不劳而收获多。

关于第一点,与货币金属论相对立的是货币名目论,认为货币并不具有商品性质,而是抽象的计算单位,是服务于商品流通的符号,没有“内在价值”,只有国家赋予的“名目价值”。

为了弄清劳动价值说误导的症结何在,须先弄清货币与“价值尺度”的关系。首先,“价值尺度”以称为“价格尺度”为好,因为如果使用“价值尺度”一词,会产生“价值尺度本身的尺度是什么”这类难以回答的问题,而对“价格尺度”的解释则十分简单:它是用数字表示单位的价格符号。其次,应当区分理想的情况与实际的情况。贵金属无疑因其本身是商品、有价格变化而不可能很好地充当价格尺度。各国所发行的纸币即符号货币迄今也都没能保持币值不变,原因有两个,一是未能避免货币的赤字发行,二是必然有比价(即汇率)的变动。如果能够解决这两点,符号货币就能够成为不变的价格尺度。

理想的情况,一是要完全避免货币的财政发行,只采用信用发行;二是要建立世界统一货币,从而不再有汇率变动。全球人类目前已达到度量衡单位等等的统一,即建立国际公制、国际标准化,也完全能够最终实现货币作为价格符号的全球一体化,建立理想的、不变的

价格尺度。目前欧洲货币一体化的进程完全可以视为未来世界货币一体化的先声和预演,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未来世界统一货币的雏型。

弄清这点之后,便不必再(其实也不可能)把“劳动”当作“不变的价值尺度”。首先,仅仅把体力劳动的时间(哪怕把它表述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当作“价值尺度”是很片面的。人类固然时刻离不开体力劳动,但不同种类的体力劳动的时间其实不可比的,人们进行商品交换时也从来不是比较所花劳动时间的多少,哪怕是在事后比较或抽象的综合比较。其次,把体力劳动等同于“创造价值”便抹杀了科研工作、经营管理工作等的意义。我国和其他有关国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轻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忽视经营管理工作等都与这一理论观点直接有关。人类有别于动物的关键主要不在于能够从事体力劳动,而在于能不断创造出新的知识、新的科学技术等。这一过程是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共同进行的,后者把各种知识整理、提高、系统化,虽然他并不直接进行物质生产,但物质生产的每个环节都离不开他的成果。此外,商业服务业的劳动,以及与物质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艺创作和演出等精神生产也都是人类所必不可少的。第三,为了说明体力劳动者受到剥削、社会分配不公,完全可以不必把体力劳动时间当作“价值尺度”去作衡量。社会分配不公的关键尺度应当是对各个社会阶层用于生活、娱乐消费所支出费用的比较,而不应当包括对生产费用的投资。而剥削率(剩余价值率)也不必去刻意加以计算,因为任何贫富悬殊、分配不公都会有目共睹,并激起公愤,直至发生人民革命。历史上的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当然,通过多种途径缓和社会矛盾,减轻分配不公,已是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普遍做法,尽管仍未完全解决问题。

现在回到价格机制与供求关系的问题上来。基于以上所论,笔者虽基本上同意王文观点,但主张应当在理论上有更大的创新,敢于提出新的理论观点来解决迄今各国经济学界都未能很好解决的这一问题。

笔者认为,应当区分开两类商品及两种决定价格的机制。第一类是稀缺的,乃至极为稀缺的物品。这一方面包括李嘉图所说“罕见的雕像和图画、稀有的书籍和古钱”、王文中所举梵高的画和吉祥号码等等;另一方面则包括天然金块、宝石,以及土地及地球上的一切自然资源。

(下转第5页)

治地位。如果它们由于体制迟迟不作变革而处在没有活力和缺乏效率的状态之中,对于我国经济的腾飞,将造成极大的障碍。十多年来,每一次经济增长加速,不要多久,就遇到能源、交通、原材料等“瓶颈”的严重制约,其原因就在这里。这种若干部门不能支持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的状态,从实物系统的观点看,叫做经济过热,在货币系统上的反映,则是通货膨胀。过去十多年中这种情况的反复出现,说明公共部门改革的滞后,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严重的消极影响。

在过去一年的国民经济新高涨中,地方、部门、企业表现了很高的积极性,分别采取了许多主动行动,推进本地区、本单位的改革开放,对市场力量作用范围的扩大和市场形成,例如自由价格制度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个别地区、部门和企业对体制转轨,特别是对于公共部门体制转轨所能够起的推动作用毕竟是有其一定限度的。因为我们的改革在过去一段时期采取了趋易避难的策略,经过14年的改革,能够分散地、自下而上地进行的改革,已经做得差不多了,现在剩下来的往往是一些需要统一进行的重大改革,象财税改革(包括税种设置、税率厘定和财政体制的确定)、金融体系的改革和产权制度改革等等,都不是个别地区和个别单位所能各自为政地进行的,而必须由国家的最高当局来作

决定。在工作的重点不够明确、改革的施工蓝图不够清晰、改革的具体措施不够有力的情况下,地方、部门和企业注意力自然而然地转向增加投资、铺新摊子、增辟开发区等方面。而且,一些方向对头,并有良好开端和前进势头的改革项目,如证券市场的建立和土地批租的开放,也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和基本规则,不可避免地出现混乱,而且由此滋生了某些也许可以称为“自发私有化”的少数人瓜分社会财产的行为。与此同时,由于无章可循或有章不遵,使权钱交易和其他腐败行为得以猖獗。在某些市场上,以国家资本为依托的投机活动成为主流,这样就使所谓泡沫经济在一定范围内发展起来。

把以上所说的一切归纳起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不论从短期的观点看,还是从长远的观点看,现在的当务之急,都是要加快关键部门的改革,使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框架在整个国民经济的范围内早日建立起来。当然,即使要建立市场经济的基础结构,也面临着需要进行的工作方面很多与力量不足的矛盾。为了缓解这种矛盾,在改革的推进上需要按照各项改革措施的轻重缓急,采取从基础工作做起,同时为进一步发展作准备,既要循序渐进,又要加快每一步进程的方针;既不逡巡不前,又不杂乱而进。(责任编辑 本刊特约编辑王骨)

(上接第15页)

源。这类商品的价格机制纯属物以稀为贵,其价格与它们的成本(包括成本为零,即不含成本的一切自然资源)不成任何比例,即完全无关,而完全取决于有效需求,即供求关系。第二类商品则是除第一类之外的所有商品,即劳动产品。对它们不应称为稀缺物品,尽管它平均利润率:当某一商品因供不应求而价格上扬,其利润率因而高于其他商品时,吸引其他厂家纷纷投资生产这种商品,从而导致供求趋于平衡,价格回降,即利润率趋于平均值;供过于求时则价格下跌,在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利润率便低于平均值,生产厂家便减产或转产,供求平衡后价格才又回升,利润率趋于平均值。或者,生产同类商品的个别厂家因技术先进或经营管理有方,或是使其成本低于其他厂家,从而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其赢利率高于同类厂家,或是其产品质量上乘,从而可能以高于同类商品的价格出售,使其赢利率高于平均值,这种效益促使其他厂家也改进工艺技术或经营管理,如此等等。这便是市场经济中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和对改进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的促进作用。商业服务业即第三产业的价格机制也大体如此。

以上所述是从微观的角度。如果是物价总水平在上升,其原因从根本上说只能有两个:或者是货币贬值(通货膨胀),或者是因自然资源紧缺而导致物价普遍上升。

自然资源是大自然的无偿赠予,其成本为零。在人口总数不高、人类科技水平不高、生产总规模不太大时,自然资源似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即供远远超过求,人们长期以来视其价格等于零。随着人口增多、人类

科技水平提高、生产总规模愈益扩大,自然资源逐渐显得紧缺,尤其是天然储量较少的一些矿藏以及适合于人类居住、耕作、活动的土地等许多不可再生的资源。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它们的价格开始不再是零,而是随着供求趋紧而愈益上升,再加上人工成本之后其价格当然更高。在自然资源的供应普遍趋紧、更加之开采成本普遍升高(例如起初可开采浅层的煤田和油田,以后却愈益只能开采深层的煤田和油田)的情况下,即便货币没有丝毫贬值,物价总水平也必然不断上升。同理,在为珍惜自然资源而开征各种资源税的情况下,税额会打入成本,从而使物价普遍上升。不过,这会促使人们厉行节约,节制消费,对于自然界以及未来世代的人们无疑是福音。

简而言之,单纯用供求关系决定价格或者单纯用生产成本决定价格都无法讲清上述全部情况,因为这是市场经济中两种不同的价格决定机制,只有两者加在一起才全面。王文中其实也暗含了类似的意思。《价格机制劳动价值说的局限和误导》一文中便有:“劳动价值属于生产成本……但是销售价格最终能否高于生产成本,却得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本文的表述显然与王文有所不同,原因在于对劳动价值说误导的解释不大相同。

最后须指出,现代西方经济学无疑有不少可取之处,应当认真研究、吸取,但它也存在一些根本的不足,应当对它施以重大改造,而不能简单地照搬。这当然远非这篇短文所能胜任的。(责任编辑 冷远猷)